

# 沈从文的东方式浪漫主义

杨春时, 徐晋莉

(厦门大学 中文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在现代性的视野下, 文学思潮是文学对现代性的回应, 不同的回应方式构成了不同的文学思潮。浪漫主义文学思潮是作为“现代性的第一次自我批判”而出现的, 以此为基础, 沈从文的创作应被归属于浪漫主义的范畴, 而且在与西方浪漫主义作品的比照中可以看到, 沈从文的浪漫主义不同于西方浪漫主义的超越性、贵族气质和神秘主义而具有的东方特色——直面现实、平民特质和理性的节制三个特点。由此可以得出结论: 沈从文的创作创造了独特的东方式的浪漫主义。

[关键词] 现代性; 文学思潮; 浪漫主义; 东方

[中图分类号] I20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3194(2006)02-0177-06

沈从文是一个在大起大落的评价中沉浮的作家, 对他作品的思潮属性更是众说纷纭。曾志清称“他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最伟大的印象主义者”<sup>[1]147</sup>, 有论者视他为实证主义的作家<sup>[2]</sup>、现实主义的乡土作家<sup>[3]</sup>、写意小说作家<sup>[4]</sup>。还有论者分析说他是“现代文化人中一个典型的自由民主主义者”<sup>[5]91</sup>, 甚至有人把他归入启蒙主义。<sup>[6]164</sup>更多的论者则认定他是“二十世纪最后一个浪漫派”。笔者也认为沈从文的创作应该属于浪漫主义思潮的范畴, 而其本人也自认是浪漫派的一员。

对沈从文创作的不同认定, 原因在于对各种文学思潮的具有歧义的界定, 而这种对文学思潮本身认识的混乱, 把文学史搅成了一锅粥。必须重新定义各种文学思潮, 而从现代性角度能够揭示文学思潮的本质。文学思潮是对现代性的回应, 不同的立场、态度和回应方式就构成了不同的文学思潮。那么, 什么是浪漫主义呢? 浪漫主义思想史家马丁·亨克尔写道: “浪漫派那一代人实在无法忍受不断加剧的整个世界对神的亵渎, 无法忍受越来越多的

机械式的说明, 无法忍受生活的诗的丧失。所以, 我们可以把浪漫主义概括为‘现代性(modernity)的第一次自我批判’。”<sup>[7]3</sup>这就是说, 在现代性视野的观照下, 浪漫主义是作为“现代性的第一次自我批判”出现的。19世纪初期, 由于工具理性发展、科学技术进步, 与之相伴的现代城市的兴起, 人类开始进入工业文明时代。面对现代性的兴起, 一部分知识分子感受到理性的压迫、自然生活方式的丧失, 因此起而反抗。卢梭惊呼“科学甚至文明不会给人类带来幸福, 只会带来灾难。”“席勒看到, 工业文明把人束缚在整体中孤零零的断片上, 机器的轮盘使人失去生存的和谐和想象的青春激情。费希特觉得自己简直无法在这样的世界里安置自己的灵魂。”<sup>[7]</sup>在这种背景下, 对工具理性和工业文明的拒绝和反叛, 成为浪漫主义文学的一个最本质的特征。

中国是否具有产生浪漫主义的条件呢? 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 尽管整体上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程度还不高, 但由于它的集中性而具有了一种在区域上畸形的高度发达, 像上海这

[收稿日期] 2006-02-08

[作者简介] 杨春时(1948—), 男, 黑龙江海伦县人, 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样的城市在三十年代则一跃而成为仅次于伦敦、纽约、巴黎、东京的世界第五大城市。畸形的城市发展模式、乡村的落后和衰落、薄弱的民族工业和严重的经济、政治、文化的不平衡,使古典与现代、保守与激进、乡村与城市于同一时态下在中国并存。这样,一方面古典、田园、乡土、传统、温情、落后、迷信往往与属己性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则是异己的现代、工厂、城市、叛逆、冷漠、先进、理性。在五四作家充满启蒙意识的笔下,在以“进化论”为基础的进步历史观的观照下“属己的”一切成了制约中国发展的绳索,而相对保守一些的作家,如沈从文,则在“异己的”现代文明中,看出了其弊端。他们坚守传统文化的属己性,抵抗现代文明的异己性,希冀向乡土文明回归。与西方浪漫主义相同的悲哀是,这种回归是无望的,而不同的却是,中国的这个回不去的乡土并不仅仅是因为其自身的发展——那不可抗拒的时间而回不去,而是具有了一种深层的被掠夺感,因为这个乡土,不是自身在时间中的发展而离去的,而是由于外来文明的侵入而失去的。因此,在这些作家批判“异己”文明的时候,多了一层“属己”的悲凉感。在三十年代,当大多数作家将农村经济破产作为叙事对象时,当整个时代在急切地追求现代性时,沈从文,这个声称只关注现象的人却开始了更深刻的探索,从维护人性的纯洁的立场,揭示现代性所显露的丑陋,开始了中国人对现代文明最初的批判和反思。因此,就沈从文作品所表现出来的精神气质以及对现代性的抗争而言,沈从文是属于浪漫主义思潮的。那么浪漫主义又具有哪些特征呢?一方面,浪漫主义相信有一个可供逃遁的理想的生命居所,并且这个生命居所人们曾经拥有过;另一方面,由于对历史的美化,他们表现出对现代文化的强烈质疑,使浪漫主义表现出浓厚的回归意识:第一,在时间上,“回到中世纪”是浪漫主义的社会理想。浪漫主义在美化历史的前提下旗帜鲜明地否定了理性主义的进步历史观,与此同时,它在总体倾向上表现出强烈的宗教气质,由此浪漫主义具有了非理性的、怪诞的神秘主义倾向,而蕴藏其间的正是强烈的彼岸意识和死亡意识。浪漫主义者以生命的偶然性、模糊性和不可解释性质疑近代以来理性精神的确定性、明晰性和可解释性;第二,在空间上,“回归自然”是浪漫主义的人生目标。浪漫主义者敏锐地感觉到了工业文明带给人类的异化,为了追求理性世界之外无限超越的可能,浪漫主义者倾心于与工业化城市异质的自然山水和那些未开化的世界。在他们笔下,有对自然湖光山色的重新认识(如湖畔诗社),有对异国情调的赞美,这体现了他们对文化的多元共生性的认同,以及对极具征服性的现代理性

文化的质疑;第三,在情感上,浪漫主义者反对工具理性,要求回归人的自然情感,这一点其实是包含在“回归自然”这个口号中的。人本来是自然的一部分,浪漫主义者将自然作为人类诗意栖息的伊甸园,唯有生活于自然中才能葆有那源于自然的情感和想象的能力,也才能了解自然的神秘并懂得敬畏。

比照西方浪漫主义的特征再来看沈从文。在沈从文笔下我们最直接体验到的是他对湘西那一片山水的眷恋。在他的作品中,他为我们描绘了那片土地和生于其间的人们。那条绵延百里的沅水长河,时时在他的笔下浮动,而漂在这河里的就是他的梦。他笔下灵性、可爱的人儿无论翠翠、天天、三三还是萧萧就生长在这山水之间——“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边城》)而“绿叶浓翠,绵延小河两岸,缀系在枝头的果实,丹朱明黄,繁密如天上星子。”则是生长天天的橘园(《长河》)。“杨家碾房在堡子外一里路的山嘴路旁。堡子位置在山弯里,溪水沿着山脚流过去,平平的流到山嘴折弯处忽然转急。”就在这远离堡子,远离人群的溪水转急处就是三三生长的碾房(《三三》)。山川赋予了她们天然的美丽和温柔,而傩送、柏子则长年漂泊在急流险滩之间,沅水上那声名远扬的青浪滩既是这些水上汉子最凶险的敌人更是他们勇气、智慧和体魄的证明,也只有这样的浊浪险滩才能赋予他们那种生生不息的刚勇和爽利。沈从文在《沈从文自传·一个传奇的本事》中也直言:“水和我的生命不可分,教育不可分。……水教给我粘合卑微人生的平凡哀乐,并作横海扬帆的美梦,刺激我对于工作永远的热情洋溢。我一切作品的背景都少不了水。”正是在这自然、明净、变化万千的流水中方淘洗出了自然、澄澈的人性,如水一般灵动、如水一般坚韧。

这就涉及到了沈从文创作的第二个特点,回归人的自然情感排斥工具理性。沈从文的作品在城乡二元的对立模式中,在愚夫愚妇身上发掘并赞美了那种看似琐碎却是源于自然的人情、人性,嘲笑并讥讽了都市人们的虚情假意和趋炎附势。沈从文这种对于顺应自然而生发出的情感、情操的赞美与卢梭的“自然人”思想是相通的。于是在他笔下,城市里的男人,即使是被誉为“千里马”的精英也不过是“阉宦”的代表(《八骏图》),女人则似乎更可厌。“她们要活,要精致的享用,又无力去平空攫得钱,就把性欲装饰到爱情上来换取。娼妓是如此,一般妇女也全是如此。”(《十四夜间》)在《某夫妇》、《或人的家庭》中,主人公如此轻易地成为金钱的俘虏,使他们的道德显得虚伪而可笑。相反,属于乡土的柏

子们虽活得穷困、艰辛却诚实可爱(《柏子》)。河街上的妓女们也一个个有情有意,可以在梦中为情郎寻死觅活,甚至杀人不眨眼的山大王也可以充满男儿血性,为一个漂亮的女土匪只身犯险(《一个大王》)。这些属于乡土的人们执著、率性、真实地以他们鲜活的生命体验、张扬的自然情感映照了城市文明中人性的苍白和猥琐。沈从文自己则说:“我就是个不想明白道理却永远为现象所倾心的人。我看一切,却不把那个社会价值搀加进去,估定我的爱憎。我不愿问价钱多少来为百物作一个好坏批评,却愿意考察它在我官觉上使我愉快不愉快的分量。我永远不厌倦的是‘看’一切。……我的爱好显然却不能同一般的目的相合。”<sup>[8]</sup>“金钱对‘生活’虽好像是必需的,对‘生命’似乎不必需。生命所需,惟对于现世之光影疯狂而已。因生命本身,从阳光雨露而来,即如火焰,有热有光。”(《潜渊》)他高扬起审美的价值,否定商业文明所带来的商品经济价值,对生命与生活的划分则又极近似于西方浪漫主义对于诗的世界与散文气的环境的区别,显然前者才是自由理想的,而后者则是没有自由可言的;他强调自然的爱与美,认为:“一个人过于爱有生一切时,必因为在一切有生中发现了‘美’,亦即发现了‘神’。必觉得那个光与色,形与线,即是代表一种最高的德性,使人乐于受它的统治,受它的处置。”(《续废邮存底·美与爱》)这种对美的追求、生命的渴望,对自然情感尤其是“爱”的张扬,与西方浪漫主义把爱视为“安身立命的根据和最重要的理论出发点”也是一脉相承的。

最后,与西方浪漫主义主张“回到中世纪”相仿佛,在沈从文的作品中也包孕着一种回望的态势。由此,在时空上造成一种强烈的往昔与当下的对比,原生态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对比。不清楚沈从文到底是否受到过卢梭的影响<sup>①</sup>,但我们认同人类文明进程在走向现代时,东西方作家可能具有“共通的心理症候”。沈从文以对湘西的记忆为基石,描画了那个历经沧桑又渐行渐远的世界。而记忆作为一种最本己的生命体验,又以其极端个人性和无法还原性赋予回忆者的特权就是不可验证性。沈从文在回忆中,将湘西的过去与现在,生命与自然编织在一起,将其幻化为人性、人情之美的理想国。“在沈从文的想象中,苗民的生活方式是中华民族年轻时期的生活方式。”<sup>[9]</sup>换句话说,沈从文以他的故事反抗着那个与现代文明相一致的“进步历史观”,而早在

1936年,他就颇以自己的“落后”为荣了:“两千年前的庄周,仿佛比当时多少人都落后了一点。那些人早死尽了。到如今,你和我爱读秋水马蹄时仿佛面前还站有那个落后的人。”<sup>[1]</sup>他以人类的过去为标本来希冀当下的人们,以我们民族童年的状态来安慰、激励当下的老大与悲伤。因此在《龙朱》中我们看见了神性;在《月下小景》中我们看见了为真爱而冲决陋俗的勇气和决绝;在《如蕤》中我们则因如蕤对野性、朴质的倾心而在现代的情境下体验了尴尬。不过,所有的回忆都是属于当下的,他对过去的眷恋是为了扭转现代的颓势。而沈从文所要确证的正是上文所提到的那种多元原生性的文化模式,并最终能够“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迈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年青起来,好在二十世纪舞台上与别个民族争生存权利。”<sup>[10]</sup><sup>[87]</sup>

在认定沈从文创作属于浪漫主义之后,更应该认清沈从文的浪漫主义与西方浪漫主义的巨大差异,因为他的东方浪漫主义不同于西方的浪漫主义。

东西方浪漫主义的差异首先体现在面对现实的态度上。西方浪漫主义者对于现实极端不满,在蔑视中自觉地疏离现实,因此他们要么干脆身体力行地离群索居,在远离城市的昆布兰湖区和格拉斯莱尔湖区尽情歌唱,要么就用自己的妙笔构筑起完全属己的精神世界,在他们的笔下给熟悉的乡村、田园,陌生的异域城邦蒙上一层梦幻的面纱而与现实产生间距,例如雨果笔下华丽、明朗的巴黎圣母院之下那个神秘的乞丐王国;要么干脆让主人公完全生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与周围现实形成对抗,而作者笔墨点染之处自然落在那个忧郁、丰富的内部世界里,例如夏多布里昂,他的主人公或者是孤独的漂泊者——勒内,或者是死后的独语者——他自己。与此不同,沈从文这个东方的浪漫主义者,他承继了中国文化的实用理性传统,因此并不逃避现实,而是急急慌慌地迎上去,为此他走出湘西进入了完全陌生的都市,而他对湘西的记忆,他的城乡二元结构的并置也都有一个现实的指向——民族的重兴。所以,虽然沈从文也倾向于向后看,在时空上以回到过去,回到现代之前的未开化世界来确认自身,但不同的是,由于西方文明自身的延续性,西方浪漫主义的回眸更为从容,也就更彻底,更个人化和精神化,他们可以充满信任地将过去的时代、原始的民族、未

① 金介甫著《沈从文传》(1987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1990年时事出版社出版中文版)第79页写道:“他对西方浪漫主义很入迷,虽然他指名提到的只有卢梭的《忏悔录》。”但,杨联芬却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3年第3期发表的《沈从文的反现代性——沈从文研究》一文中明确指出,凌宇曾经问过沈从文,是否接受过卢梭的影响,沈从文肯定地回答“没有”,他甚至没有读过卢梭的书。见吉首大学《首届沈从文学术研究会发言摘要》,《沈从文研究》第232页,湖南大学出版社,1988年。

开化的文明当成能够最后安身立命的大地,并在作品中显示出这种回眸中的终极关怀,在其中叩问存在与虚无、有限与无限这类形而上的问题;而沈从文的回眸,由于自身文化在新的、异己强势文化的催逼下已然显现出劣势,因此他的回眸就不仅具有了时间性,还具有了空间性,即与异族文化对照、比较的特征。在对照比较中,民族近代所承受之苦难,民族未来之希望就成了那一代知识分子不可能不系于心的问题。于是这样的回眸,必然与现实相牵涉。正如有学者已经分析的那样,“正是对中国社会现代文明的历史进程中‘民族品德的消失’、‘人性’的堕落、人类‘不可知的命运’的忧患意识,及‘重造’民族的不懈追寻,构成了沈从文创作的内在动力与思想内核。”<sup>[11] 28</sup>因此,在他笔下的湘西世界“与和谐的自然、人性美相对立的野蛮、杀戮、原始的宗教迷信、愚昧的道德规范,使这块古老而美丽的土地涂上了它特有的文化形态——宗法制度与原始文化合一的专制统治。”<sup>[12] 137</sup>也就是说,他的文化视野并非是单向度的,正如他在《长河·题记》中所言:“‘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因此我写了个小说,取名《边城》……即拟将‘过去’和‘当前’对照,所谓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可能从什么方面着手。……《边城》中人物的正直和热情,虽然已经成为过去了,应当还保留些本质在年青人的血里或梦里,相宜环境中,即可重新燃起年青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因此,他的作品最终指向是“重造”民族文化。读者往往忽略了这一点,作者也在《习作选集·代序》中不无遗憾地说:“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在《散文选集·序》中他一再提示:“我的作品一例浸透了一种‘乡土抒情诗’气氛,而带着一份淡淡的孤独悲哀,仿佛所接触到的种种,常具有一种‘悲悯’感。”也就是说,他所描绘的湘西并不完全是“世外桃源”,而是充满忧伤和艰辛的人生图景。这既有沈从文审美选择的偏好,但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现当代的作家,他对于现实还有责任,他要在他的作品中作出一种具有超越性的反思和批判,由此我们才会在他充满野趣的传奇中倍感叹息,如《媚金·豹子与那羊》、《月下小景》;在他那些温婉明媚的故事中读出难言的忧伤,如《边城》、《萧萧》、《三三》、《灯》、《会明》;在他们的背面所隐藏的悲剧确实比表面所见出的美丽更深沉、更撼动人心。正是“对于农人与兵士,怀了不可言说的温爱”(《边城·题记》),他才写了他们平凡生活中的“常”与“变”,才写了他们生活的环境、他们的风俗、劳作和他们的哀乐,这一切在他细腻的笔下栩栩如生,故而,人们说

他描绘了一幅幅湘西动人的风俗画。

由此引出沈从文不同于西方浪漫派的第二个特点——平民性的乡土气派。沈从文浪漫主义的乡土气派与西方浪漫主义所具有的贵族传统截然不同。西方浪漫主义继承的是贵族精神,具有宗教的、形而上的品格,他们往往以人的个体的自由完善、自然天性中对超越的追求展开对工具理性以及城市工业文明的批判,在题材内容上侧重展示皇宫贵胄和教会僧侣等上流阶层的人和事;他们笔下的乡村也是经过贵族式美化后的乡村,田园亦是属于上流社会眼中的田园,在这里没有劳作的艰辛,少见民间的疾苦,而多写贵族个体的优游和冥思。这些作品往往更具思辨性,强调灵肉、正邪、美丑、善恶的直接对立,在极端的戏剧性冲突中展现人性以及人生中的大悲大喜,最终获得情感的净化和超越;在总体上追求一种倾向于崇高的审美趣味。而东方的浪漫主义则与此不同。沈从文不是描写上流社会的高雅情趣,而是写乡下人的日常生活。而且,假如说西方浪漫主义者是心怀虔诚,双眼仰望上帝的话,那么中国的浪漫主义者则是心怀悲悯地注视着芸芸众生,如果说,西方浪漫主义者是倾向于悲天的,那么中国浪漫主义者则更多是悯人的。这与他继承了中国文化、文学的平民主义传统有关。中国社会是平民社会,中国文化是平民文化,这与西方的贵族社会与贵族文化截然不同。因此,东西方浪漫主义具有了不同的文化资源和社会品格。中国浪漫主义是平民化的,沈从文直言:“我实在是个乡下人……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爱憎和哀乐自有它独特的式样,与城市中人截然不同!他保守、顽固、爱土地,也不缺少机警却不甚懂得诡诈。他对一切事照例十分认真,似乎太认真了,这认真处某一时就不免成为傻头傻脑……”<sup>[19] 157-158</sup>然而这个“乡下人”是如此地渴望着生活——粗糙的真实、底层的社会、生命的痛苦、穷困的现实,他全盘接受,在其中去发现美,最终他把勇敢、坦率、热情、诚实、坚韧等一系列美德毫不吝惜地赋予了那些来自社会底层却更能顺应自然的人们:农人、兵士、水手和妓女。

沈从文用一个乡下人的心和眼来观照生活,对于他笔下的湘西世界,他没有“五四”启蒙主义者惯常的揭露落后或启蒙愚昧的居高临下的视域,而是抱着平等的意识,以平视的眼光来看待那片土地和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人们。因此,童养媳的故事在他笔下并不成为控诉的文本(《萧萧》),老兵的人生理想也不再令人觉得无聊、可笑,而让人觉得竟是温暖得如慈母一般(《灯》)。他忘情地沉浸到民间的氛围中,在凡俗和日常已然被神圣与革命瓦解了的时代,大量地描写了民间的风俗习惯、日常的凡俗人

事和生活情景。在节庆的欢娱热烈和劳作的艰辛中感受俗众的哀乐荣辱。因此, 他所诉说的关于湘西的一切, 没有深刻的理论却多了一份迫近人生真实面目的体验。

这就涉及到下面一点——沈从文笔下的“悯人”情怀。他并不追求西方浪漫主义所企求的超越感、崇高感或是对绝对和永恒的把握, 而着力书写那最迫近人生的体验——悲哀。在他的作品中悲哀是如此寻常而又深沉。它不同于西方浪漫主义的激烈, 它淡淡地袭来, 在不知不觉中让你体验到那种宿命般的一生一世的悲凉和那种既无力抗争又无法回避的让人绝望的悲哀。如那个在不知不觉中忽然来到身边给女孩和母亲带来奇异的“城里”之思的白面少爷, 却在人美梦正酣时毫无缘由又似乎合情合理地离去, 生命轻易地玩弄着俗人的梦想和愿望(《三三》)。而事实上, 这种悲哀, 无英雄主义冲决天地的痛快淋漓, 却更痛彻人心, 因为它是最经常地属于凡人的悲哀, 它绵密而又丝丝入扣地织进普通人的生命中去, 使其生命抹上一层无法褪去的黯淡底色, 成为最接近人间的伤痛。人活着并承受着它, 即使绝望仍然是平静的绝望, 正如三三和母亲在听闻白面少爷的死讯后仍要回碾房继续碾谷子, 翠翠在爷爷死后仍将一个人在渡船上等待一样。沈从文的文字中流淌出来的正是这种不同于大悲大喜的凡俗人世的悲哀和艰辛, 但展现出的人的坚韧和承受却使人性一次次接近了神性, 最终闪耀出生命的庄严和魅力。

这就说到了沈从文不同于西方浪漫派的第三个特点——理智性。西方浪漫主义秉承希伯来文化的神秘、怪诞传统, 拒绝理性、平凡, 强调“真正的诗所唯一承认的东西, 是令人惊叹的东西, 不可思议的东西, 神秘的东西。”<sup>[17]30</sup>他们试图以神秘、怪诞的诉求来反抗理性文明所提倡的明晰性和确定性, 他们希望生命保有其应有的神秘感, 让人们懂得对生命、对神的敬畏, 反抗理性主义对生命的肆意解剖和对神的亵渎。而沈从文却与此不同, 他所向往的、一心希望建造的是一座供奉人性的庙宇, 而人性在他笔下就是自然而然地承担命运中所遇到的一切悲喜哀乐。因此即使他写的是来自边缘地域、边缘文化中的故事, 其人、其事、其情并不荒诞也不神秘, 相反他们给人们一种亲切感——其人物所处之境澄澈明净, 所行之事源于自然, 人物本身也一个个率真可爱、毫不造作。因此当兄弟二人一起喜欢上一个姑娘时, 他们直截了当说明白, 而后在深夜上山去为姑娘唱歌(《边城》); 当爱情需要信物时, 男子会不计后果地去寻找那只洁白的小羊, 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媚金、豹子与那羊》)。如果一定要指出它具

有的异域风情, 那只能说, 是这个封闭地域的人们保有了化外之民的自在状态, 他们具有一种未经斧凿的天然的生命之美、生命之媚。沈从文在《凤子》中谈到, 在未经“文明社会”的规矩绳墨的世界里, “一切皆为一个习惯所支配”, 却又无不合情顺理, 人性与自然是一合的, 人性与神性也是一合的。所以它毫不神秘, 它只是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神之存在, 依然如故。不过它的庄严和美丽, 是需要某种条件的, 这条件就是人生情感的素朴、观念的单纯以及环境的牧歌性。神仰赖这种条件方能产生, 才能增加人生的美丽。缺少了这些条件, 神就灭亡。”<sup>[11]133</sup>对于这样一种毫不神秘的对于神的认识, 其间的理性特质是显而易见的。在审美情趣上, 沈从文的东方式浪漫主义尤其是后期作品所追求的也异于西方, 他“极力避去文字表面的热情”, 强调“恰当”、“节制”, 具有古典气质, 追求恬淡从容的优美的审美境界。

西方浪漫主义的精神资源来自中世纪文化传统, 它秉承了很多希伯来文明的非理性特征。当这样一种以非理性为核心的文化思潮传入中国后, 由于中国文化自身强大的实用理性惯性, 自然对它作出了改造, 因此中国文化人大多接受了它崇幻想、重主观、多抒情的一面, 而对其非理性、神秘、荒诞以及宗教方面的旨趣则加以摒弃。沈从文作为一个作家, 既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更是一个理性的创作者, 他说“一个伟大纯粹艺术家或思想家的手和心, 既比现实政治家更深刻并无偏见和成见的接触世界, 因此它的产生和存在, 有时若与某种随时变动的思潮要求表面或相异, 或游离, 都极其自然。它的伟大的存在, 即于政治、宗教以外更形成一种进步意义和永久性。”<sup>[11]296</sup>由此可以明显看出, 一方面他像西方的其他浪漫主义者一样自觉地疏远政治, 但他的疏远却又并非像西方浪漫主义者那样是与宣扬个体情感的自由宣泄相联系的, 而是相当自觉地追求一种别样的永久性、进步性, 其实就是一种更健全、美好的人性, 而这份人性又恰恰是与道德理性密切相联系的, 这是沈从文自身的矛盾性与特殊性所在。他所构筑的城乡二元世界中, 既有对于现代城市文明的批判、反思, 还有一份“隐伏的悲痛”和“浸透其间的悲悯”。因此, 一方面“湘西世界”使“城市文化”呈现出病态, 另一方面, 其自身也隐藏着无法摆脱的忧伤。在弥漫了妩媚、缠绵情致的柔美文字的背后“你感到的正有道德感的隐隐的制约。因而这世界越纯净, 越光润, 越合于传统的审美规范, 也离‘纯粹自然’越远。”<sup>[11]129</sup>因此, 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已然是作为现代文化人沈从文记忆中的湘西, 它渗透了作者的审美情感, 显示出作者审美趣味。从早

期的《雨后》、《龙朱》、《神巫之爱》、《旅店》到成熟的《边城》、《湘行散记》、《湘西》、《长河》,其笔墨由纵情任性、绚烂多姿而至委婉节制、澄澈明净,其间恣肆奔放的原始情调、深山大泽的蛮荒野趣尽数化去,而终获纯净、和谐,合于中国传统的文化思想、审美理想。其后期作品中的这种“节制”的特征是相当明显的,也正是在这种“节制”中才可能勾勒出中国式乡村社会的静谧和诗情。

正像所有浪漫主义对现代性的反抗一样,沈从文作品本身也触及到了伦理主义和历史主义的二律悖反。人类社会的历史进步往往是以伦理的相对退步为代价的,而人类精神又恰恰要求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上的伦理主义复归。五四时期中国面临的生存危机,迫使人们站在历史主义的立场上,争取现代性,批判传统文化。但是沈从文则站在历史主义的反面,批判现代性,呼吁伦理的价值回归。他自己也直言不讳地说:“我的读者应具有理性,而这点理性便基于对中国现社会变动有所关心,认识这个民族的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边城·题记》)这

样一种判断是基于伦理主义的,也是一种审美判断,它超越了历史主义,也超越了保守主义。从恣肆张扬到温婉含蓄,从畅快淋漓地抒发生命的激情到以恬淡平静的笔墨抒写生命的怅惘,在审慎与热情的冲突、文明进程与人性束缚的矛盾之间,沈从文完成了从空间上以乡土视角见出城市文明之堕落、委顿,从时间上以今昔对比吟出东方田园之挽歌的过程。沈从文所关注到的正是这个人类也许永远也作不出完美回答的问题,在他成熟的作品中,我们进一步能体会到他对道德沦丧的忧愤和人性复苏的良苦用心。沈从文把人性改良作为了自己毕生的事业,这一点使他具有了与 20 世纪中国主流文学不同的气质。他不为政治、救亡这些一度神圣的革命话语所狂热而试图建造一座更为坚实、可靠的人性的庙宇,他将人性置于神圣的殿堂,给予其宗教般的地位,赋予了人性一种抽象的、形而上的品格。由于这个更高的价值标准,他才不会随波逐流,不因政治的变动而变迁;他的创作才具有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难能可贵的,具有恒常性的精神质素。

#### [ 参 考 文 献 ]

- [ 1 ] 曾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刘绍铭等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 [ 2 ] 马小彦.沈从文的创作与实证主义[J].河南大学学报:社科版,1995(6):24-27
- [ 3 ] 卢凤.现实主义创作道路的广阔性和作家的艺术独创性——叶圣陶、沈从文、张天翼的小说比较[J].文艺理论与批评,1998(5):88-94
- [ 4 ] 王义军.审美现代性的追求——论中国现代写意小说与小说中的写意性[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
- [ 5 ] 赵学勇.沈从文与东西方文化[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5
- [ 6 ] 贺兴安.沈从文评论——楚天凤凰不死鸟[M].成都:成都出版社,1992
- [ 7 ] 转引自刘小枫.诗化哲学[M].兰州: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
- [ 8 ] 沈从文.沈从文自传[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
- [ 9 ] 金介甫.沈从文传[M].符家钦译.时事出版社,1990
- [ 10 ] 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第一集(文学理论集一)/苏雪林.沈从文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 [ 11 ] 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 [ 12 ] 赵学勇著.沈从文与东西方文化[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5
- [ 13 ] 赵园.论小说十家[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

### SHEN Congwen's Oriental Style Romanticism

YANG Chun-shi XU Jin-li

(Dep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In the view of modern literary thoughts are responses to modernity from literature. Different responses from different literary thoughts. This thesis regards Romanticism as "the first advertisement on the modernity". SHEN Congwen's literary works should belong to Romanticism. After making the initial analysis o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Western Romanticism and SHEN Congwen's Romanticism, this thesis points out that SHEN Congwen's works differ from Western Romanticism. The latter chases transcendency and has aristocratic spirit and mysticism, the former has their unique features: caring about reality, commonality manner and rational abstinence.

Key words: modernity literary thought Romanticism the Orient

[责任编辑、校对: 诚 钧]